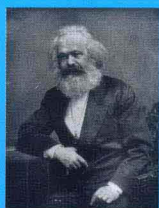


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聊城大学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 主办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History And Socialism
Research Edits Publication*

国际共运史与 社会主义研究辑刊

2013年卷（总第3卷）

程玉海 张祥云 秦正为/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聊城大学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

主办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History And Socialism
Research Edits Publication*

国际共运史与 社会主义研究

2013年卷 (总第3卷)

程玉海 张祥云 秦正为/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共运史与社会主义研究辑刊. 3, 2013 年卷/程玉海, 张祥云, 秦正为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17 - 1697 - 2

I. ①国…

II. ①程… ②张… ③秦…

III. 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 文集 ②社会主义 - 文集

IV. ①D1 - 53 ②D091.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946 号

国际共运史与社会主义研究辑刊. 3, 2013 年卷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王丽芳

编辑信箱 shymeme@sohu.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简介

聊城大学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简称世界共运研究所），始建于1985年4月，时名“共产国际研究室”。1987年改名为“共产国际研究所”，1995年改名为“世界共运研究所”。目前共有研究人员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博导2人，硕导12人，校聘优秀人才7人，博士13人，在读博士4人。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等领域教学科研、资料建设、建言献策、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学科与学位点建设上，依托世界共运研究所，聊城大学2001年获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硕士点，2003年获批国际政治硕士点，2006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硕士点，2010年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自1991年起，聊城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连续被遴选为山东省“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重中之重”强化学科。2004年，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成为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下设的4个研究所之一。2005年，经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批准设立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

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世界共运研究所主要负责承担聊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等本科专业的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等硕士专业的教学工作。多年来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和领导干部，为科教兴国、兴鲁、兴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资料建设上，世界共运研究所拥有独立的资料室，现有藏书15万册，

报刊2万余册，覆盖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特别是拥有《共产国际》（俄文版）、《社会党通讯》（英文版）等一批珍贵外文文献。1985—1998年，世界共运研究所先后主办《共产国际研究资料》、《共产国际研究》和《世界共运研究》杂志。受山东省委宣传部委托，1989—1992年主办《苏联东欧动态通报》内部资料。2000—2005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复印报刊资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杂志。2004—2006年，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合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11年起，编辑出版《国际共运史与社会主义研究辑刊》学术年刊。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淀，世界共运研究所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政治与外交等多个相对稳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并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多次承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点教材编写研讨会、全国国际共运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等重要会议。近五年来，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论》、《冷战后欧盟诸国社会民主党政坛沉浮研究》、《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等著作20余部，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立项与奖励20余项。学科带头人程玉海教授，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华中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张祥云教授，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中青年学术骨干、山东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山东省社科人才库专家。

目 录

Contents

苏俄与中国西藏关系探微

——基于两份档案材料的考察 程玉海 秦正为/1

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思想内涵 张祥云/14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启示

——基于“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不是

社会主义”的思考 陈兆芬/25

布哈林悲剧再研究：以党内民主为视角的考察 刘子平/36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性质新论 张英姣 孙启军/45

布莱尔对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与调整论析 李华锋/54

最熟悉的陌生人：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政治分析 李华锋 /68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思想 赵常伟/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秦正为/87

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创新 ... 秦正为/102

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 秦正为/114

中国文化外交模式建构

——以孔子学院为例 李德芳/129

冷战后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与对策..... 李华锋 /137

影响德才兼备用人标准落实的制度困境及其归因 于学强/148

刍议官德的认识困境 于学强/157

浅议规避干部选拔工作中的腐败 于学强/168

党政干部“弱势感”解读 刘子平/178

网络反腐：兴起缘由、价值解读与风险防范 邹庆国/186

人大监督的动力贫困与动力生产 孟宪良/197

浅谈转型期我国农村公民参与问题及解决路径 张西勇/208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 李合亮/218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孟宪霞/230

《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评介
..... 周浩集/242

《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体系的视阈》评介 张英姣 孙启军/245

《当代中国外交新论》评介 佚名/2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论》评介 佚名/252

《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民主化研究》评介 佚名/254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2 年年会在青岛召开 秦正为/256

当今世界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12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李华锋 秦正为 /258

苏俄与中国西藏关系探微

——基于两份档案材料的考察

程玉海 秦正为

摘要：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和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也在力求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其中，就包括苏俄与中国西藏的联系。通过对两份档案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一联系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苏俄致函中国西藏表明态度；互派宗教使者进行试探；联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政治化。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与中国西藏的政治联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但其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并给人们以深思。

关键词：苏俄；西藏；关系

作者简介：程玉海（1954—），男，山东聊城人，青岛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秦正为（1973—），男，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世界共运所副教授，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十月革命后，苏俄（本文所指也包括苏联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和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也在力求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其中，就包括建立和发展苏俄与中国西藏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关注，学界研究也极其欠缺。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一问题相对于苏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关于这一

问题的史料少之又少，加之其秘密性和复杂性，因而长期难以为人所知。但是，作为苏俄对华关系的历史组成，其所反映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因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苏俄与中国西藏联系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苏俄与西藏的联系，并不是突兀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时代背景。

首先，沙俄很早并且一直在侵略染指西藏。沙皇俄国很早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西藏，企图“直叩印度的大门”^①。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被中国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但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②基于此目的，在沙俄政府驱使和支持下，军人、商人、教士和间谍不断渗入中国西部，积极探察实施路径。这是沙俄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③随着俄、英在中亚地区扩张竞争的日趋激烈，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西藏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侵略行动。陆军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配合下，派遣将校级军官率领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打着“地理考察”、“学术研究”的旗号，到西藏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搜集情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陆军上校普里热瓦斯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前者因“卓越功绩”被提升至少将军衔，死后名字被沙皇用于城名和山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42页。

② 张伟：《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四）：沙俄间谍病死西藏》，载《环球时报》，2005年12月7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

后者在西藏留学多年，成为达赖的经师和亲信，积极策动外蒙独立和挑拨西藏独立，并成为沙皇和达赖相互联络的关键人物和信使。1913年1月，德尔智非法签署所谓的《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①。由于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尔智此举未能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悻悻返回西藏。此后英俄在瓜分西藏和蒙古问题上虽达成默契，但直至1917年沙皇统治被推翻，沙俄始终没有停止对西藏的间谍活动。沙俄对西藏的侵略和间谍活动，既为苏俄与西藏的联系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和条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障碍。

其次，俄国与西藏有着独特的宗教渊源。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图瓦人等信奉喇嘛教（俄国对藏传佛教的称呼）。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属于蒙古语族，图瓦人属突厥语族，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至今，都和佛教的传播密不可分。18世纪初，布里亚特蒙古人臣服沙皇俄国后，由于反抗异族心理的需要，由原来信仰萨满教而改信藏传佛教，并于1171年建起了该地第一座寺庙——楚戈尔庙。卡尔梅克人属于西部蒙古，17世纪初开始信奉黄教。图瓦即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16世纪末黄教传入，图瓦人成为突厥语诸族中唯一信奉喇嘛教的人。可以说，这三个种族近几百年的编年史基本构成了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史。历史资料记载，到19世纪时，布里亚特寺庙已有几十座，有些寺院巨大而豪华，喇嘛数以千计。19世纪末，佛教传入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沙皇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喇嘛教来加强对布里亚特人的控制，给了喇嘛教发展的机会，使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1741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下诏封立可汗喇嘛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领，佛教大兴。18世纪时，布利亚喇嘛沙亚额夫受凯瑟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观光，这是欧洲国家人士第一次到达西藏。在沙皇的支持下，佛教得到迅速发展，俄藏之间的佛学交流也日益加强，涌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的佛教史上颇有争议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多尔耶夫（Dorjiev）。有资料说他是沙皇物色的间谍，为遮人耳目，他以僧人的身份在拉萨学佛研习，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被指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成功

^①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地打入了西藏政权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并为沙俄和西藏的联系穿针引线。1912—1915年，多尔耶夫在达赖喇嘛5万银币的支持下，于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礼仪的佛寺。到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境内已有大小佛教寺院151座，喇嘛1.3万人。俄国与西藏这种独特或得天独厚的宗教渊源，成为沙俄与西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突破口。

再次，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干涉迅速发展。东印度公司建立之后，英国就开始觊觎西藏，但很长时间内未能得逞。1876年，英国借助《烟台条约》的签订促成了《入藏探路专条》，获允开通印藏交通。在经历各种试探、间谍活动和波折后，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商埠。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伸进了西藏。1895年开始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十分痛恨英国侵藏，在沙俄的拉拢下，十三世达赖逐渐产生了联俄抗英的想法。英国十分顾虑沙俄势力插足，为了压服西藏，1903—1904年英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侵藏战争，1万多英军攻占了拉萨。战后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攫取了更大特权。1913年10月—1914年7月，英国殖民者策划举行了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策动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十三世达赖特使、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会议期间，麦克马洪提出划分内藏、外藏和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对于英国的分裂企图，北洋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会议宣告破裂。但英国侵藏野心和活动并未终止。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干涉及其势力的不断增长，既是苏俄联系西藏以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考虑之一，也是不敢与西藏深入交往以免激化与英国矛盾的极大顾虑因素。

最后，苏俄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调整。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废除沙俄的对外政策，实行和平外交，建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关系。但由于内外战争的影响，未能及时清理沙俄与西藏的关系。1920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基本稳定，苏俄开始进行外交政策的调整，积极探索和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对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和盟友抉择的考虑，苏俄一方面谋求与中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与中国外蒙古、东北、新疆、唐努乌梁海、西藏等地区，与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多方联络，甚至签订了一些地方性的条约。为了改善远东局面，苏俄于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1922年9月4日先后发

表了三次对华宣言，并派出代表团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最终促成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两国建交。但在此过程中，苏俄也支持了外蒙、唐努乌梁海的独立自主，并力图在东北、新疆谋取利益和独特地位。在与各派势力探索交涉后，苏俄经过权衡决定由原来的联“吴”（佩孚）转向联“孙”（中山）。尽管在革命战争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和斗争，但苏俄毕竟在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势力的交涉中获得了较大成功。在此过程中和在此前提下，苏俄开始试图利用沙俄对西藏的影响，特别是俄国与西藏的宗教渊源，重新建立与西藏的联系。

二、有关苏俄与西藏联系的两份档案及其基本情况

关于苏俄与西藏联系的档案材料，就笔者所了解，较为真实可靠的有两份：一份是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之《苏联与西藏的联系》所辑几个函电，一份是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中的《契切林就西藏考察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2月6日）》。前一份档案中的几个函电包括：《西藏全体噶伦就处理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问题给达赖的呈文（1920年冬）》并附《俄外交大臣的对照信》、加拉罕《致法王达赖喇嘛（1922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致村晓堪钦函稿（1923年4月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函（1923年6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十三世达赖函（1924年6月3日）》、《达赖喇嘛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函（1924年10月20日）》。这几个函电，从时间跨度上，基本涵盖了联系的全程始末；从信件内容上，基本贯穿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这些函电，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联系的细节、双方的态度。后一份档案是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18—1930年任职）就第二次西藏考察2万金卢布拨款被否决而给政治局写的信，其中谈到了第一次考察团的成果（特别是无线电台的使用）、第二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这两份档案之所以真实可靠，更为重要的是：一份来自西藏地方档案，一份选自苏联历史档案，二者能够彼此对照、相互印证，从而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事件的全貌；《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

规划重点项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界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而成,因而这些档案材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极强的真实性。这两种档案汇编(选编),资料丰富、真实可靠,因而影响较大,长期以来被人们作为研究苏联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的案头之作和必备工具。但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这两份档案,由于在庞大的资料汇编(选编)丛书中显得微乎其微,并不引人注目,加之问题本身也并不太“重要”,因而对之研究和利用相对较少。不过,要关注苏俄与西藏的联系问题,乃至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两份档案材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两份档案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和厘清苏俄与西藏联系的历史背景、大致过程和基本情况。根据材料可以看到,苏俄之所以力求与西藏联系,一是英国特使对苏俄的“妖魔化”,即把苏俄“虚伪地介绍”为“一个只剩下沙漠和痞棍的国家”,“将苏维埃政府描绘成残酷迫害佛教的政府”^①;二是苏俄认为与西藏联系“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经济意义”,因为这样既可以联系整个佛教界,也可以“异乎寻常地复活与所有佛教国家的商品交换”,并可以在亚欧之间“好好地完成我们贸易中介人的作用”。^②根据事件的进展,我们可以将这一联系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俄致函西藏表明态度。1920年9月15日,为了“十分真诚地向西藏人致以怀有友好愿望”,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函第十三世达赖,表示:苏俄是民主政权,俄国各族人民在其领导下“各自获得了各自的权利”,而且正与欧洲农民紧密联合。还说,苏俄政府曾宣布“俄国人要把东、南亚人民从欧洲贪婪的王臣富豪手中解放出来”,而“俄藏紧密联合后,无论西藏受到任何外部之侵犯,需要我们俄国人援助时,一定按尊意行事”。并表示,我们不会有像沙俄那样的“侵吞”行为,而是“决心要帮助西藏人从外敌之手解放出来。如您有同样的意愿,也许会派人前来(同我们)就俄

① 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页。

② 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藏目前和长远的联合事宜进行友好的商讨。此信及使者到达那边后，您有何考虑，务请回复”。^①同时还送上象征“善良愿望”的哈达、金质表、夜光闹钟等礼物。第十三世达赖收到信函后，将其交给西藏主要官员进行了讨论，认为“有害无益”，故只给以收条。

第二阶段，互派宗教使者进行试探。考虑到政治和外交联系的困难，苏俄开始利用特殊的宗教渊源联络感情，先是在信奉佛教的布里亚特族、卡尔梅克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修建了一些寺庙，并保持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后又请派宗教使者往来，邀请西藏宗教人士前往游览和讲经。1921年秋，苏俄派出了包括桑吉在内的第一个西藏考察团。同年，第十三世达赖派侍读大堪布罗桑阿旺率弟子前往苏俄。1922年，第十三世达赖又派秘书洛桑沙拉德金，进一步试探苏俄对西藏的态度。苏俄原准备派出第二个西藏考察团，但由于2万金卢布拨款被政治局否决一度受阻。1922年9月，第十三世达赖加派群则·罗桑协饶前往莫斯科，作为罗桑阿旺的助手，苏俄第一次考察团的桑吉随同回国。此间，双方虽是宗教往来，但已包含政治试探和政治行动。苏俄的第一个考察团带去了无线电台，并物色到了政治上“很可靠”、“很忠诚”的人士，并认为继续进行这种考察具有“政治意义”。罗桑阿旺等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就藏俄关系与苏俄政府进行了谈判。对此，苏俄曾向达赖许诺：“同其他捍卫自身独立的人民一样，在需要的时候，西藏可以指望我国的支持和援助。”^②为进一步加强俄藏联系，1922年11月，加拉罕通过罗桑阿旺的小弟子土登居美给十三世达赖带去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实为副外交人民委员）签名、外交人民委员部盖印的密信，表示为了解决双方的联系、避免“您的邻国”的封锁，“在最近派遣一个经您的代表阿旺德尔智堪布同意，并由他参加组织的人数不多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拉萨是有益的”。^③并认为这一“新步骤”将会进一步巩固俄藏的“友好关系”。对此，鉴于英国势力的影响，

①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685页。

②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页。

③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页。

心存犹疑的第十三世达赖并未同意，指出汉藏冲突已由英国人作中间人；至于矿藏，早由藏人自己采掘；“若俄国在拉萨常设使节，并（让他）到西藏各地考察，则以英国为代表之其他各外国必将效法，那时将很难拒绝。既如此，希望维持俄藏友好现状。”^①由此可见，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对俄藏关系发展仍怀有戒虑。

第三阶段，联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政治化。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此时苏联国内外形势也大为好转。经过前一阶段的联系，双方关系日益密切。1922年苏俄使藏人员受到“欣然接纳”，并得到了“西藏国主张（同俄国）亲近的思想不变”^②的复函。对此，苏俄“极为高兴”，不仅让罗桑阿旺及其助手罗桑协饶“料理布里雅特和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佛教等事务”，其他各方面活动也给予尽可能好的帮助，而且“打算让此二人从事使东方各小国免受大国暴行欺凌之工作”。^③同时，鉴于当今有人对西藏“怀有难以容忍的嫉恨，并在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着武力进攻的准备”，1923年俄历6月9日，加拉罕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致函达赖（达赖1924年6月3日收到），表示“派去才仁多吉及其助手等旅游学者前往（西藏）。（一）是为了持续不断的友谊而奉献礼品；（二）是为了详细陈述此间之制度情况，并详细了解你处之制度；（三）是为了促进友谊；（四）是为了就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相互交往，与（你们）很好地进行商谈”。^④最终，代表团顺利成行。1924年，由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签，中苏建交在即，第十三世达赖为保西藏“独立”，一改原来的犹豫态度和消极被动，开始积极主动地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先是派土登居美带信给苏联，表示“我们大国的深厚友谊永远不变……外交大臣亦不变”。对此，苏方也表示：“联盟共和国首都的人士都以极其高兴之

①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②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③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④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

心情表示衷心感谢。”^①由此可见，双方的关系已经极为密切和融洽，并且完全政治化。在此基础上，为了建立正式的“经常的关系”，1924年6月，苏联派出了特使布里索，以“在需要采取有益于藏人的行动时”，找到“有利的办法”。^②十三世达赖对此也是“甚喜”，不仅亲自接见了即将回国的才仁多吉，“与之详谈”，“望俄藏友好能依然如以前一样稳固”^③，并赠送阿西哈达一条、五两藏金一封。同时，对使者布里索“尽量给予了友好接待”，并答应对“布里雅特和土尔扈特人来藏朝佛”^④给以帮助。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远隔万水千山，联系极不方便，除了一些宗教交往外，苏联与西藏的政治联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苏联的外交重心在于欧洲和远东，对外蒙、东北、新疆、唐努乌梁海等更为关键地区的密切关系已经建立，苏联和共产国际推动的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其对华影响力和控制力得到迅速增长。因而，苏联不愿再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中央政府、国共合作的新政权以及英国等积怨太深，故将西藏问题长期搁置，未再发展关系。此后，也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国共两党都未能顾及西藏问题，致使西藏亲英美势力迅速膨胀。

三、关于苏俄与西藏关系的启示

苏俄与西藏的联系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否则不但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而且也会给本国和他国造成恶劣的深远影响。苏联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膨胀，以及造成的悲剧

①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

②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③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④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

后果，不能不与此有关。鉴往知来，为此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刷新外交关系，必须彻底清除历史遗毒。苏俄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其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制度应该也是崭新的。为此，必须彻底清除作为“各民族监狱”的沙皇俄国的种种历史遗毒，彻底清除“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①。对此，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如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至1923年9月先后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②。但是在实践中，苏俄并未完全将其贯彻落实。特别是斯大林，不但经常流露出俄罗斯“弥赛亚”情结，把扩张有功的沙俄将领视为“英雄”，而且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如1934年当有人建议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时，斯大林非但不同意，反而就此问题在给政治局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说：“十分卑鄙齷齪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③对此，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④最为典型的是外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也是如此。苏俄不但充分利用了沙俄对西藏的影响资源，而且沿用了沙俄对西藏侵扰的一般手法，即进行宗教拉拢，利用喇嘛教作掩护进行政治活动。尽管苏俄与西藏的联系并不太久，但遗毒未除，以致流害无穷。此后，苏联曾经多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据有关媒体统计，1991年苏联解体前，达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②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7页。

③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④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 308.